



话语、权力与实践
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

姚国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话语、权力与实践

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

姚国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权力与实践: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姚国宏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8
ISBN 978-7-5426-4918-8

I. ①话… II. ①姚…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809 号

话语、权力与实践: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

著 者 / 姚国宏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60 千字

印 张 / 20.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918-8/B·378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6475597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当代底层研究的若干进路与特征	3
三、当代底层研究关键词:话语、权力与实践	9
四、整体构思与主要结论	28
第一章 底层(subaltern)划界	34
一、底层概念的比较分析	34
二、底层划界的主要标准	45
三、底层划界的基本原则	52
第二章 当代底层研究的话语资源	56
一、底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57
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权力理论	73
三、解构主义理论	79
四、后现代的多元与差异理论	86
第三章 印度庶民学派的底层研究	93
一、庶民学派概述	93
二、庶民研究中的后现代方法论	96
三、倾听“历史的细语”	105
四、被治理者的政治	112

第四章 底层叙事的后殖民视角	130
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	131
二、西方君临东方	136
三、中心支配边缘	144
四、白对黑的傲视	150
五、男性统治女性	158
第五章 弱者反抗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171
一、斯科特农民政治学的理论视野	172
二、从“道义经济”到“理性小农”	177
三、弱者的日常反抗	185
第六章 文化政治中的底层书写	198
一、英国文化研究概述	200
二、工人阶级意识的自我建构	207
三、从阅读政治到差异政治	218
四、文化政治与新社会运动中的底层	231
第七章 当代底层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批判	237
一、底层问题的知识论检视	237
二、当代底层研究的思维革命	259
结 语 全球化、后革命语境下的底层解放	281
一、革命与解放:现代性的双重召唤	281
二、告别暴力,解放主题重新出场	287
三、“多元底层”何以可能?	292
参考文献	306
后 记	316

老实说,自 19 世纪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明确发出反道德主义的呼声之后,研究底层似乎就有些力不从心,或者说就缺乏某种恰当的“政治正确”。在尼采看来,道德不过是穷人、弱者、边缘群体、奴隶、乞丐等等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呻吟和梦呓而已。成为一个人,就要成为超人,刚健勇猛,一往无前,终生伴随的是雄狮般的意志。底层的存在,甚至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在尼采那里,女人、奴隶、病人等等都是不值得同情的底层人。在尼采的笔下,最常见的大众形象就是一群动物,有时还会将大众描绘成一群毒蛾,或毁坏生机勃勃的组织的两点和杂草。尼采的这些描述和判断,一直如梦一样缠绕着我——尽管在略早于尼采、他的德国同胞马克思那里,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看成是强者与弱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绵延不断的战争与冲突;在尼采去世之后的 20 世纪,在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召唤下,广大无产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力图实现自身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天,底层依然广泛地存在着;甚至在一种新的话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下,底层不但变得界限模糊,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因而,我们不得不要与底层继续纠缠。

一、问题的提出

写作本书的缘由,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末阅读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在该书第一卷的开篇,他这样写道,“翻开叫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接踵排衙而来的,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只要在那上面留下了文字的就算‘永垂不朽’。经典、经典的征引、注

释与解说、精英的文字论述,则把思想史的线索连缀起来,只要被采撷在书中,经典就真的‘名垂青史’。而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的照片。”^①葛兆光先生在这里力图推出他的问题:思想史是否仅仅就是这样一种写法?毫无疑问,思想史的这种写法,既有悠久的历史,也得到人们普遍的支持。首先,人们一般会认定,真实的思想史历程就是由这些精英与经典构成的,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思想的精华进入了社会,不仅支配着政治,而且实实在在地支配着生活,它们的信奉者不仅是上层知识阶层,而且包括贵族、平民阶层,于是,描述那个世界里存在的精英与经典就描述了思想的世界。其次,思想的历史是一个一个思想家构成的时间序列,基本上按照时间的推衍,思想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后面的思想家由于可以看到前面思想家的著作,所以他们的解释和阐发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因此,描述了思想家的序列等于描述了思想的历史。^②然而,相应的疑惑也就产生了。如果说思想史是对历史的观念性读解,那么,这种读解出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吗?在这种读解中,我们能够看到断壁残垣、萧瑟秋风、街谈巷议、柴米油盐、寒来暑往、春种秋收、家长里短,这样一些跟日常世界的琐碎生活最密切关联的东西吗?

当时正是世纪之交。在中国语境中,“三农”问题(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者如火如荼地讨论和关注,连一向以“阳春白雪”见长的文学与诗歌也加入了这样的合唱。现代化背景中漂泊的农民和因为市场经济变革导致的大量下岗工人,因为这些学术性关注,似乎一下子从非常底层、边缘的位置进入到社会的中心——当然,这种中心不是这些群体以自己的财富、身份、地位、名望乃至权力而成为现实的中心,他们不过是众多的学者和理论家学术消费的对象和话语。^③葛兆光先生的上述文字连同21世纪初的中国如此灼人的现实,在我的心中构成了黑白分明而又彼此缠绕冲突的世界。因此,本书的写作,某种意义上是对书中所提到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若干底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2005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南帆教授曾主持一批博士就底层问题进行了一场对话,对话的记录以《底层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为题发表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这篇对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批评的意见,指责这篇对话晦涩、空洞,堆砌了一大堆术语,如同学术“黑话”。另一些更严厉的观点认为,这场对话是学院派在抢占学术话语资源。季亚娅也指出,底层大众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不那么感兴趣,真正对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掌握话语资源的精英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关注底层的动力来自四个方面:1.作为底层书写主流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巨大的审美(转下页)

层研究流派的回应,并努力实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的期待。传统思想史、哲学史、科学史等诸多史学领域,基本上都是葛兆光意义上的精英的历史,这些历史中是没有底层的位置的。当然,本书写作并不是要为底层列传,让他们挤入思想史的精英阵营。果真如此,恰恰违背了后现代底层书写的初衷。

放眼当下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的儿童在饥饿中死去,有太多的女性受到男权的蹂躏,有大量的普通民众在人肉炸弹、恐怖袭击中消失,更有国际强权挥舞着自由的大棒,要求别国唯其马首是瞻。总之,从族群到个体,从国际到民族国家内部,无数的灾难、不公在上演,无数无助的弱者在哀嚎。但被现代性的发展主义话语所建构的时代,似乎为物质的繁荣鼓噪得荡气回肠,却可以让人对这一切视而不见,都兴冲冲地直奔那最后的主题:精英、财富、地位与权力。形形色色的底层的声音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声音又是怎样被无情地淹没了,他们能不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如果不能,仅仅靠别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代言,能改变自身的底层命运吗?这些并不艰涩的发问,回荡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众多关于底层思想研究的文本和叙事之中。

二、当代底层研究的若干进路与特征

关于“底层”的学术研究,自马克思开始至今一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文明的存续和人性的解放。就其渊源,底层思想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社会等级的划分;17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则试图从经济角度分析社会之所以划分为不同阶级(等级)的原因;18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也耳、基佐等人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充分肯定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把

(接上页)现代性的冲动,借用底层的巨大能量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2.底层或者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存在的他者,可以满足底层之上的人们某种窥探和猎奇的欲望,并进而进入相关题材的影视中成为文化资本追逐和消费的对象;3.对于底层人道主义同情式的书写,起着建构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抹平”功能,因而容易得到主流政治权力的认可;4.对于少数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人来说,底层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重回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政治策略。因为昔日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以及反对阶级压迫的内容正是借助底层问题重新浮现出来。回头来看,21世纪初参与底层讨论的知识分子,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只要基于学术研究的平等精神,有根有据地言说他们所理解的底层故事,对于不占有话语权的底层来说,都是一件有价值且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一般读者的私下交流是不能发出声音、被聆听并被看重的,只有介入学术界乃至决策层的争议之声,才不致沦为“空白书页”的“隐性文字”。参南帆等,“底层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季亚娅,“底层叙事:言说的理路与歧途”,《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姚国宏,“漂泊的命运”,《读书》,2000年第1期。

阶级斗争看成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为马克思的以阶级理论为核心的底层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来源。

20 世纪初，在马克思之后兴起的各种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底层研究从经济学、政治学等比较单一的视域，推向以文化批判为中心的总体性领域。比如，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其中，明确地提出“底层”概念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他在《狱中札记》里为编纂“底层阶级的历史”勾勒了方法论的轮廓并且特别强调了资产阶级文化意识霸权在型塑作为底层阶级的农民以及产业无产者过程中的重要性。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关于底层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底层研究者们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一元主义、反科学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等精神与方法引入底层研究，着力开拓传统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新的文化与时代的结合。这些研究成果以“话语”、“权力”及“实践”相贯穿，在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与新发展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等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文化、哲学思潮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至此，后现代视野的底层思想研究，在 60、70 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存在着诸多的进路或范式：

一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并延续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底层研究。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在《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中认为，由于当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多元分化以及不同斗争主体之间同质性的降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作为底层的无产阶级解放所依托的统一而普遍的暴力革命模式将日益为一种多元的民主斗争所替代。他们试图为包括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等底层的斗争领域提供“激进民主”这样一个最一般的理论构架。而一些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如福柯，借助“微观权力”、“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等概念，揭示了“底层”的多元图景及其被建构起来的历史和现实。福柯对游行、札记、仕女手册、医疗条件、宫廷习俗、教会信条、巫术与反巫术等社会行为、文本和现象，都抱有强烈的兴趣。他的权力谱系学突出体现了一种力图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的特权地位，破除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的同谋关系的战斗意志。在他那里，谱系学的最高使命就是去拯救被压制的、边缘化的、非统一性的乃至非理性的知识，让这些非主流的对象（主体）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二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南亚的印度为学术空间逐步形成的印度庶民

学派的底层研究。庶民学派鉴于传统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型塑下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史观及底层民众在历史叙事中的缺席,开创出一种“重读”精英主义历史书写并将被遮蔽的历史还原出来的“底层史观”。他们的研究,呈现了底层的这样一种形象:底层的历史是碎片化的、非连续的、不整全的,底层内部的意识也是分裂的乃至对立的,它是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因此,当代底层研究的主题和方法都要有一个显著的转向: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谁是底层”或“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成”,而是“底层为什么要代言”、“底层能否被代言”以及“底层如何被代言”的问题。

三是带有浓厚后殖民主义色彩的底层研究。后殖民视角的底层叙事拓宽了底层的界限,从场域、空间、种族、性别等不同层面揭示当代底层的一般图景。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白人(欧洲)/黑人(非洲)、男性/女性等一系列的二元架构以及其中蕴涵的压迫性关系的揭示和批判。法国思想家法农通过《黑皮肤,白面具》、萨义德则借助《东方学》,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出发探讨了“东方”背后隐含的殖民、压迫、建构和想象的西方因素,认为没有真正的东方,现有的各种叙事中的东方不过是西方话语建构的产物而已;以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面孔出现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则通过强调底层能否说话的问题,集中探讨了后殖民背景下的女性底层阶级的特殊处境和命运。

四是以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 斯科特为代表的、从政治社会学的微观角度展开的底层书写。在《弱者的抵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等著作中,斯科特探讨了农民这一现代性视域中的底层的生存伦理与社会公正感的冲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法”来“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拒绝“底层无政治”的偏见,并以“公共政治(精英政治)/底层政治”、“公民社会/政治社会”两分法勾勒出与精英政治迥然有别的独特的“底层政治”,揭示了政治与底层之间的复杂纠缠,由此开启了以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在欧美思想界及至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五是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所开启的文化政治维度的底层研究。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汤普森及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汤普森在1963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特别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事物,明确反对底层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文化政治研究发展到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种族”和“性别”则受到格外重视。从而,文化研究进入一个多元的时代,推动了

由发达西方社会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地的性别政治(传统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斗争及新形式下的同性恋群体争取合法性的运动)、生态政治、身体政治、种族认同、废核运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堕胎运动、城市运动、消费运动、休闲运动、宗教运动等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开展。

除以上所重点描述的当代底层研究的诸多进路之外,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则突出强调了作为社会成员的女性不仅仅面临马克思所描述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还存在着在无产阶级甚至社会主义内部反对作为他们的父亲、丈夫、儿子的男人的斗争;而以查尔斯·泰勒、沃尔泽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承认的政治”为少数民族、“贱民”群体以及女性等底层争取到平等的社会权利,等等。总之,这些思潮庞杂、观点歧义的诸多底层叙事,尽管并不遵循完全一致的逻辑,有时彼此之间还存在着非常激烈的论辩,但可以大致概括出以下特征:

第一,学科与方法的交叉与异质。上述简单罗列的底层研究流派或思潮,涉及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英国新左派历史学、法国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少数者话语、文化多元主义、文化人类学等诸多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就本书所重点关注的底层流派而言,从学科归属来说,可以看到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学术地理空间的交叉和重叠现象。比如,发端于印度的庶民学派,表面看来,是一种立足于传统历史学科基础上的史学研究。庶民学派的代表人物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就明确指出,“《庶民研究》是一个有关印度历史研究的系列出版物。丛书明示的目标,就是将庶民阶级的历史纳入到民族主义史和国家史中去,并抗衡历史学中的一切精英主义的偏见。”^①但这种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比较,在研究的目标和手法(方法论)方面,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庶民学派的开拓性人物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特别指出,从殖民统治者为其侵略和统治印度而搞的印度史,到民族主义者抵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编纂的印度史,都是书写精英的历史,这种精英主义包括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其最明显的遗漏是忽略了“人民的政治”。^②由此,庶民学派开拓出的是一种以“人民的政治”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这种历史研

① 查克拉巴提,“少数族群的历史,庶民的往昔”,载刘健芝等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13页。

② 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载刘健芝等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古哈此处的“人民”,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古哈指出,“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的劳动者构成的庶民(subaltern)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同前书,第6页)

究,是对官方或由官方支持的国家历史叙事的强有力的挑战,它更关注“历史的细语”(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努力呈现那不可呈现的过去,从而实现底层“过去的在场”。这样一来,福柯式问题(Foucaultian questions),即谁有权定义什么该是“正史”,或在这种定义语境下发生作用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一下子就鲜活起来。由此,庶民学派的研究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不可避免地就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后学”的特征。进而言之,不懂得与后现代相关的这些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不能在方法论上有所跟进,就不可能从事庶民学派所推崇的史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庶民研究就不是传统史学一个单一的学科所能承载的了。

再比如,斯科特关于东南亚的农民研究。表面看来,他是以在生存线边缘挣扎维生的东南亚传统农民为研究对象,力图呈现那些在传统历史学、精英政治学中只具有统计学数字意义的最底层民众的政治行为、政治特征和政治逻辑。但他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诸多方面,其学术成果跨越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若干学科领域。因此,从传统的单一学科视角来读解斯科特的底层研究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当代底层研究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让我们不仅对西方在启蒙理性主导下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标准及其认识论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而且强调权力与资本的历史相分离,主张在澄清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基础上深刻理解民族叙事和国家话语的解构;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通过对启蒙理性话语的批判,他们与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德鲁兹等后现代思想家们结伴而行。所以,要对当代底层思想研究进行一个明晰的学科划界是非常困难的。正如沃勒斯坦在谈到他的“世界体系论”的学科归属时所言,“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历史学,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会学,世界体系否定与这些仍然框定我们大学体系的 19 世纪的范畴有任何知识的相关性。世界体系分析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①

第二,不同底层研究学派彼此之间的交叉、渗透与借鉴。比如,印度庶民学派的底层研究借鉴了以 E. P. 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后者正是作为文化政治取向的底层研究在英国的代表——从他们那里习得社会史学家“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历史视野,汤普森对“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概念的阐释也深刻影响了庶民学派“政

^① 沃勒斯坦,“序言”,载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第 1 页。

治社会”架构的建构；而庶民研究学派的学术旨趣同样也推动和促成了对非洲、拉丁美洲、土耳其等更为广阔的时空视阈中的底层研究。如，1992年，“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在美国成立，其宗旨就是运用与庶民研究相似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拉丁美洲研究。而萨义德基于后殖民视角的东方主义论述对庶民学派也有很大的影响。庶民学派重要成员查特吉2004年出版《被治理者的政治》一书，在该书的扉页特别提到，“献给杰出的学者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 - 2003)”^①

第三，当代底层研究的许多重要学者，其身份具有浓厚的“杂交”或“混合”的后现代特征。不论是庶民研究学派的古哈、查特吉，还是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以及文化研究学派的开拓者斯图亚特·霍尔（出生于牙买加，后任职于英国伯明翰大学），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当代底层研究学者大多出身于第三世界（以印度、中东地区为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并最终在西方学术界确立了自己全球知名学者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学术经历和文化身份，一方面“使他们能够自由穿梭于多种文化传统之间，既有西方学者少见的批判意识，又比第三世界同行多出一份敏锐”，^②因此，他们更能够在不同的知识和文明的边界上做出有分量的反思和批判。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行为也受到人们的质疑，那就是他们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享受着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和舒适，但在学术立场和文化情感上又拒斥西方的现代性对他们出生地的原住国的文化启蒙，力图留住农业时代的世外桃源。这种种族身份和文化情感的混杂与冲突，导致他们的理论话语在遭遇现实世界时往往陷入无助和无力的状态。

第四，当代底层思想研究几乎共同分享了马克思的诸多遗产，是一种“为穷人说话”的理论。比如，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强烈的批判精神；热情地相信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论题，比如自由、平等和秩序；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压制人的潜能发展的不公平的剥削制度，认为在一个没有剥削和支配关系的社会，人的潜能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并且把人类的解放作为他们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也特别强调实践（当然，他们主要感兴趣于局部性的、地方性的实践）对于底层自我解放的重要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把马克思作为直接而重要的言说对象，更体现在他们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理论内容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从而彰显出马克

① 帕萨·查特吉，《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陈光兴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扉页”。

② 赵旭鹏，“‘庶民研究’：一种激进史学的兴衰”，《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

思关于人类社会解放的理想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但是,作为具有典型后现代取向的底层研究,他们坚持基本立场上的异质性、差异性和历史性以及一种从局部到全球进行概括的倾向。与马克思相比较,他们不再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的当然执行者和主导者,而是认为彼此异质的多元斗争主体平等自由的存在,各阶级阶层、被压迫的广大民众(包括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和平运动等等各种斗争和对抗的主体)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奴役力量的平等一员;在斗争形式和路径方面,他们特别强调话语在底层解放中的意义和作用,认为底层解放的问题也就是能否摆脱被代言的命运问题,把底层阶级的斗争看成一场争夺文化领导权、话语权的斗争;因此,底层斗争的实践随之转化为话语实践和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博弈。

可以看到,当代底层研究的诸多流派极大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将对底层的考察视野从单向的、普遍的、宏观的转向多元的、特殊的、地方的;底层研究由点到面视界不断拓宽,呈现多元发散的趋势。它早已越出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而深入到底层的文化意识、社会权力(尤其是微观权力)、建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围绕底层的、跨学科的、多视角的研究场域。但是,由于后现代取向的底层研究对多元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过分强调,也使得在底层解放的具体实践上,陷入一种无立场、无中心的虚无主义状态。

三、当代底层研究关键词:话语、权力与实践

后现代视野的当代底层研究,与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在哲学等领域的转向有着密切的联系。简单来说,在哲学领域,表现为从近代认识论转向语言学,意味着话语被凸显出来;在政治领域,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表现为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意味着权力,尤其是那种日用而不知、如毛细血管般遍布社会世界的微观权力被凸显出来;在生活领域,则表现为从思辨转向具体的日常生活,意味着实践,尤其是以关注人的最直接生存的生活实践被凸显出来。这三个转向直接对应着话语、权力与实践三个关键词。因此,本节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的背景性考察,力图对当代底层研究的思想坐标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1. 关键词之一:话语

话语,作为20世纪开始出现、并深刻影响当代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的一个重要概念,充斥着极其复杂的语义纠缠。理解当代底层研究的这个关键词,首先需要有一个哲学背景的把握。我们知道,西方哲学自古希

腊发展到 20 世纪的漫长的哲学史,学术界大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围绕着三个不同的主题,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向。首先是古希腊时代以探求万物本源的本体论哲学;其次是近代以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和争论,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及至 20 世纪,哲学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学,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家”,实现语言学转向。

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语言的理解经历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立场上的变化,即从语形学发展到语义学再到语用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属于语形学阶段,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之间、表达式之间的形式关系,关注人类语言的构成规则、构成句法和逻辑顺序,以确定我们如何有效地说话,这主要属于符号逻辑的研究范围,基本上是对语言的静态式理解。就此而言,语形学不涉及语言的意义及如何有效地提升语言的意义等问题。罗素的“逻辑同构”思想和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学理论都属于这个范畴。逐步地,语言学家们发现,语言不仅仅关乎基本的构成法则,它更涉及其中的意义。同样的一句话,对不同的人往往引起不同的反应,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语言本身没有承载意义,那它对人类就是无用的。所以,语义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表达式同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语言并不是僵死的结构或符号,每一个字词、每一个句子都蕴涵着某种特定的意义。然而,意义要被有效地发挥出来,还需要某种专门的技巧甚至“权术”。一句话,由谁来说、怎么说、用什么样的句式和语气说,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要求,其后果也差之甚远。这就是语用学的问题,它主要涉及符号和它的解释者、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的使用问题。由此,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语言学基本上就被决定性地导向语用学的方向。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语言游戏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都是这方面的重要理论成果。

要理解话语,需要专门理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即“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可以指称任何具有意义蕴含的特定行为或陈述,比如,身体的运动、眼神的交流、口头表达以及文字的书写等等都可以称之为语言,体语、眼语、手语等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我们一般使用语言都是在狭义上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套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它是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当然,也有一些语言逐渐地湮灭和消亡。就此而言,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社会性的,它服务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传递并呈现出一定的内容和意义。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

会交流的产物,是一种集体习俗,是约定俗成的,以致是“一种社会制度”。^① 所以,语言的典型特征在于共时性、确定性、不变性、稳定性和本质性的一面,否则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就难以进行交流和沟通。言语则是个人的实际言说,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因为各种各样的需要所进行的、并打上强烈个人烙印的语言运用活动,如说话、文学创作、诗歌书写、课堂授课等等。它是个人对语言系统(字词句、语法规则等等)的具体运用,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② 所以,言语无疑具有具体性、个别性、变动性和非本质性的一面,因为任何言语都是出自个人之口,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音调、口音、语速、情感、意向和关切。而听话者则只能够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则和约定去理解和接受言语者的话语。由此,语言的普遍性与言语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当然,这种矛盾说明语言和言语之间具有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恰好证明了索绪尔的有关“语言系统”的思想,使他提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具有辩证性质。^③ 由此可以看到,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讨论,是从结构的方面对语言的研究,是把语言当成一个自足的系统,当作一种完整的和静止的形态,来分析语言的内在结构。这个结构是自足自洽的、完整融贯的,尽管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但索绪尔关心的不是语言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以及如何形成的,而是静态地关注这个已经形成的东西本身。

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

在中国大陆,discourse 通常被译为话语,而在港台和其他地方的华语刊物上,则被译为“述说”、“叙述”、“说法”等等。在法语中,“话语”比较接近于“闲谈”、“自由对话”、“即席演奏”、“对事实的叙述、陈述”、“夸夸其谈的演讲”、“语言”或“言语”。戴维·克里斯特尔主编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中,对话语的定义是,“语言学此术语指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特别是口语)。但是这个宽泛的定义有好几种不同的应用。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一段话语是语言学中具有前理论地位的一个行为单位:它是一些话段的集合、构成各种可识别的语言事件,例如一次会话,一个笑话,一次布道,一次采访等。”^④这主要是从话语的表现形式方面所作的定义。但这个定义似乎仍然具有浓厚的传统语言学的静态特征。这种静态的语言学理解,明显缺乏话语概念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学因素。话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陈嘉明,《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125页。

④ 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页。

语理论专家迪林(George L. Dillion)认为,“我们不能把话语视为一套形式化的、确定无疑的结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话语理论对言语行为理论过度关注个体言语行为,而忽略其社会因素,或制约因素的做法持批评态度。”^①迪林对话语的这一理解,极大地拓宽了话语应有的内涵。具体来说,话语并非仅仅是语言学的单位,而是人类行为、互动、交流和认知的单位。话语不是一种词语和意义静态的、透明化的、结构的一致性,而是一种利益争斗、力量博弈和冲突的动态领域。

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相比,话语的概念有着明显不同的出发点。这首先体现在话语概念所持有的立场上。如果说前二者是结构主义的,话语则是在实践主义的视野中被阐释的;话语是动态的视野,“语言”和“言语”是静态的结构;话语不考虑或说不关心语法规则、言说逻辑,更多关心是谁在言说,依据什么来言说,言说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力图揭示某种话语生成的机制及其要达到的目标等等。下面,我们力图对话语的内涵作如下五个方面的描述。

第一,话语是一种语言游戏。游戏的语言观主要得益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对语言的创造性理解。温奇(E. Winch)在《社会科学的观念》一书中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概念,认为存在着许多用语言玩的游戏(检验假设、规定秩序、问候等),并将这一理念拓展为在不同文化中建构的语言游戏。这些游戏中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规则或标准,以使得游戏对于参与者都是有意义的。^②人们通常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主义是以“表象”或“表征”(representation)为中心,而后现代主义是以“语言”为中心。所谓以“表象”或“表征”为中心,就是指现代主义认识论在认知外部世界方面,力求呈现客观真理和内在规律,打开自然这本大书,在艺术创作上则强调如何通过文字、符号来真实呈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加突出语言的游戏性质和实验特征,不寻求语言的客观意义和确定不移的真理内容,并试图通过语

① Dillion, George L, Discourse: Discourse Theory [C]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211.

② E. Winch,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后现代文本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构造物”,探求或推敲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真理”不是读者的要务,他只要关注当下的阅读体验和感觉即可。1969年英国小说家B.S.约翰逊(B.S. Johnson, 1933-1973)别出心裁地发表了一部装在盒子内、封皮可以移动的散装活页小说《不幸的人们》(The Unfortunates),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语言游戏精神发展到了极致。阅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全书松散的27章重新排列,任意组合,从而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愉悦。